


2011

導言：中國生命倫理學前途何在？

Ruiping Fa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repository.hkbu.edu.hk/ijccpm>

 Part of the [Applied Ethics Commons](#), and the [Medicine and Health Sciences Commons](#)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HKBU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中外醫學哲學》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HKBU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repository@hkbu.edu.hk.

導言： 中國生命倫理學前途何在？

范瑞平

本期所刊論文均以儒家傳統倫理為出發點，探討新的生殖技術所帶來的道德挑戰以及軍隊醫學在當代所面臨的道德問題，故以“儒家傳統與新的挑戰”為題。論文曾在今年7月香港浸會大學應用倫理學研究中心舉辦的第五屆「建構中國生命倫理學」研討會上交流，後經編者評議和作者修改而成。

光陰如梭。本刊與香港浸會大學應用倫理學研究中心籌辦的一年一屆「建構中國生命倫理學」研討會，已經五年。五年下來，不少作者和我們一道，對於“中國生命倫理學”及其“建構”，都有了一些切實體會。流覽本刊這些年來所發表的論文，可以看出一個鮮明的努力方向。然而，有人認為，“建構中國生命倫理學”是一個假命題；理由在於：大陸的生命倫理學已經發展了三十年，可以說“三十而立”，儘管我們需要進一步與時俱進，提高學術水準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但無須再來“建構”我們的生命倫理學。在我看來，這一表面上合理的觀點其實是通過故意混淆兩種不同意義的“中國生命倫理學”來合成的。沒有人否認中國大陸三十年來一直有一些學者在研究生命倫理學問題，樂意把自己在中國所做的這類研究稱作“中國生命倫理學”，也未嘗不可，沒有人會有興趣反對。然而，這類研究基本上是以學習和遵照現代西方生命倫理學原則的方式進行的。我們只是從西方舶來了生命倫理學理論，把現代西方價值當作“普世價值”

范瑞平，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中國香港。

或者“硬核”，將其給予本土化應用。但這種舶來性的研究難以與根植於國人心中中華傳統文化進行有機的對接與交融，反時有抗拒與對峙之勢。我們是否提出了任何不同的東西呢？具體說來，我們是否以中華文化為根基、提出了任何不同於我們所進口和翻譯的西方生命倫理學（特別是美國喬治城大學的生命倫理學四項基本原則）的理論建樹、研究方法或問題範圍，進而得到國內或國際學術同行的重視、討論、反響，從而可以標誌出一門確實有別於熱門的西方生命倫理學的所謂“中國生命倫理學”呢？放眼望去，這後一種意義上的“中國生命倫理學”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難覓芳蹤，大概至今尚未成形。我們提出“建構中國生命倫理學”，正是從後一種意義上進行考量的，根本沒有貶低任何人在前一種意義上所做的貢獻之意。的確，我們沒有必要抹殺三十年的歷史，因為那是我們自己的發展歷史。但是，我們需要往前走。

1998年，香港浸會大學應用倫理學研究中心主任羅秉祥教授和我創辦了本刊——《中外醫學哲學》。贊助者為香港浸會大學應用倫理學研究中心與美國《醫學與哲學期刊》社。頭幾年的期刊主編是邱仁宗先生、杜治政先生、羅秉祥教授和我。杜治政先生和趙明杰教授曾為本刊在大陸發行作了很多努力。由羅教授和我一道草擬的“發刊詞”表明：“《中外醫學哲學》想望在醫學哲學及生命倫理學領域架起一座中西溝通的橋樑。無疑，當代西方在這一領域處於領先示範的學術地位，可供學習和借鑒；但東方在人文醫學傳統及倫理價值資源中悠久深厚的靈根植被，也應該得到發掘和培植。”當時雖然沒有明確提出建構中國生命倫理學的主張，但我們號召探索東方道德資源的深意，正是為了強調我們的生命倫理學研究和教學要貼近自己的歷史和現實，挖掘不同於西方思想的東西。事實上，“發刊詞”明確指出，我們要“與西方學術真誠相對，互通有無”，就是說，不要一味地照抄照搬西方的觀點，要爭取拿出一點自己的“有”來。為此，香港浸會大學應用倫理學研究中心這些年來專門籌辦了“建構中國生命倫理學”研討會，徵文召集來自大陸的學者進行學術探討。

近五年來已有近百名學者（特別是中青年學者）參與了這些研討會。除羅秉祥教授外，中心副主任陳強立研究員、後來加入中心的張穎研究員以及中心的工作人員，都為此作出了極大的人力和物力貢獻。顯然，這是一項基於中國文化的學術事業，只要有這種文化情趣的人，都可以參加，而不論這些人是澳門人、臺灣人、還是澳洲人、美國人。因而，這裏根本不存在“為什麼中國的生命倫理學要香港的一些人來建構”的問題。

提出建構中國生命倫理學，絕不是號召停止學習西方生命倫理學。事實上，我們對西方生命倫理學只學了點皮毛，對於它的歷史脈絡、文化淵源、現實糾葛，只有一知半解而已。為此，在創辦了“建構中國生命倫理學”研討會之後的第二年，香港浸會大學應用倫理學研究中心開始同時舉辦中美生命倫理學暑期研討班，邀請美國生命倫理學家恩格爾哈特 (H. Tristram Engelhardt, Jr.) 教授講解美國生命倫理學的由來。恩格爾哈特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但也是一位著名的道德多元主義哲學家。他瞭解中國具有不同於西方的悠久歷史和文化，不贊同把任何現代西方意識形態或原則提升為“普世價值”而強加到別人頭上，支持我們所提出的建構中國生命倫理學的主張。我在國際學術會議上多次看到，中國學者被迫講著我們並不熟悉的外文、用著似懂非懂的詞彙、卻竭力“發揮”著某種流行的西方理論，要麼通篇不見中國文化的蹤影，要麼把中華倫理作為負面的或枝節的東西，三言兩語打發掉便完事。這時候，西方學者大都會以耐心的微笑瞧著你講完，並在茶歇時走到你面前說“謝謝你！你講得很好！”第一句話應該是真誠的，但你若把第二句話當真的話，你可能還不瞭解他們對待沒有正式註冊的外國“學生”的一般禮儀。現在來了一位恩格爾哈特，直截了當地告訴我們，我們其實並不那麼瞭解西方的文化傳統，我們完全可以用自己的文化傳統說話。我們卻嚇壞了，以為他別有用心，猜測他可能是因為我們沒有像他那樣相信“上帝的存在”而要把我們的生命倫理學一筆勾銷。我們的自信心實在太弱了！

建立自信心需要增強學術功底，增強學術功底需要虛心學習，包括重新學習我們自己的文化經典。“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中國大陸實在有點“毀”人不倦的味道：老一代被政治運動毀了很多，新一代不知要被社會浮躁毀去多少？西方的東西學了點皮毛，不可能深入進去；中國的東西還在肉裏，卻看不出來。表面上對於中國文化具有十足的批判意識，實際上全是鸚鵡學舌，隨波逐流，根本不去作具體、細緻的分析論證。事實上，無論我們採取何種態度，中國文化傳統還在中國社會和我們身上發生深刻影響。正如本期作者賀苗在其論文中指出：“經過千百年文化積澱，傳統儒家倫理的核心價值和人倫精義早已融入廣大民眾的日常生活和觀念世界，並通過多種多樣的民俗、風俗或習俗得以流傳和積澱，潛移默化地影響和左右人們的觀念與行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提出以中國文化為根，借鑒（而不是照搬）西方思想，建構中國生命倫理學，應對中國現實問題，難道不是一個非常自然的提議嗎？張舜清說得好，“傳統就是當下生活不可人為主觀剝離的一部分。人類的生活總是建基於這種傳統，並在它的更新基礎上才有可能真正發展出未來的生活模式。”當然，中國文化傳統並非只有儒家一派。事實上，我們這幾年的徵文廣告一直在倡導論文作者“從中國某一傳統倫理學派（諸如儒、佛、道、中醫等）出發，論述當代重要的生命倫理學課題。”

當代中國社會面對著許多尖銳的生命倫理學問題，諸如本期作者楊放所論述的軍醫生命倫理問題（軍事醫學科研、疫苗使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生態倫理以及戰場器官移植、戰地安樂死），孔祥金、趙明杰所論述的供體精子生殖技術的應用與儒家道德的衝突問題，張舜清所討論的克隆人問題，劉閔所討論的是否應該向個體參與者告知生物信息庫研究結果的問題。我們已經認識到，這些問題同儒家傳統價值密切相關。但我們只是發現了問題所在，還未能作出深入分析、論證和發展。例如楊放指出：“受傳統儒家倫理思想注重德性修養的影響，國內軍醫倫理研究從一開始就注重軍醫道德的內練

與昇華，但卻疏於倫理困境的道德剖析；注重道德原則的一般規範，但卻疏於不同境遇的倫理抉擇。”這些年來，本刊一直想在所發表的論文中體現出我們自己的一點“有”來，以便同西方學術真正“互通有無”。應該說，我們做得還很不夠，距離王彩霞等作者所提出的構建理想（“唯人為貴”的人本觀，“義利兼顧”的利益觀，“天人一本”的自然觀，“貴生愛物”的生命觀，“樂生順死”的生死觀，“君子義為上”的社會責任觀）——如果考慮到具體內容的話——還十分遙遠。

有人認為，任何國家或地區的生命倫理學的發生發展，有許多因素促成，包括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因素，當然也有個人的因素，但絕不是按照任何人的旨意構建的。這種觀點令人費解，不知道它的確切意思是什麼。如果意思是說一位學者沒有提出建構中國生命倫理學的權利，不應當嘗試按照自己的理想（例如自己心目中的中國生命倫理學應當採取的發展方向）來從事並號召別人一起來從事這樣的生命倫理學，那麼一個關鍵問題是，這種觀點憑什麼可以有否定別人提出“建構中國生命倫理學”的學術自由呢？也許，我理解錯了這種觀點，它的意思不是干涉學術自由，而只是認為這樣的提議是不適當的。那麼你的理由何在呢？不能只是因為“有許多因素促成”這一條理由吧（即使這一條算得上是“理由”的話）？莫非學者只應當跟著潮流走、繼續背誦“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決定論教條嗎？最後，也許這種觀點只是預測學者按照自己的意願來建構中國生命倫理學的努力是不能成功的（大概還是因為還有“許多因素”在起作用）。我想，對這一點，倒不必過分勞心。中國的傳統智慧認識到“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我們只當“盡人事，聽天命。”成功不必在我，但求問心無愧。“古今多少事，漁唱起三更。”在這個喧鬧的世界上，能夠安心、平靜地做一點自己認為正當、有益的學問，本身就是福氣。實際上，學者不是預言家，誰也不知道未來究竟會發生什麼。

生命倫理學的研究方式是什麼？是“放風箏”還是“騎單車”？有人認為應該是“騎單車”，不應該是“放風箏”。其實，這兩個比

喻類似於方法論中常講的“自上而下”(top-down)的策略與“自下而上”(bottom-up)的策略：前者側重理論推導，後者強調問題優先；邏輯學中的演繹推理與歸納推理是其原型。當今許多學者都認識到，一個整全的研究方法論是兩者都要包含的，道理很簡單：理論終究要與問題會面，而問題勢必求助理論的觀照。也就是說，中國生命倫理學可能既是“騎單車”的活動，也是“放風箏”的活動，並非二者必居其一；能否做得腳踏實地，其實不在於你是“放風箏”還是“騎單車”，而是在於你怎麼放、怎麼騎。中國生命倫理學的理想自然要多過以生命倫理學問題為導向的“騎單車”活動，因為它要求從一種理想的生活之道出發來定位、解決和評價這些問題。中國這塊土地上現有的和不斷出現的各類生命倫理問題、悖論和難題不能作為孤立的問題來處理，而是要嵌入中國人生活的完整圖景之中。建構中國生命倫理學的目的恰恰在於為這些問題尋求更切合自身文化傳統的思路、解說、方法、理論和解決之道。也就是說，你放的這隻風箏要接上地氣，不要只借西風。如果你囫圇吞棗地照抄照搬現代西方的理論和方法，以為找到了指導中國騰飛的“神州二號”，其實只是放了一個喪失地氣、甚至斷了連線的風箏，而你自己也可能成為一個沒有底氣而飄飄然的學者。

另一方面，建構中國生命倫理學並不是出於單純比較研究的興趣，也不是完全出於對傳統的熱情，而是為了釐清我們的處境、根基和進一步建設的出發點。就此而言，它正是一種勘測地形的實際工作，是一種“騎單車”的活動。然而，選擇“騎單車”的學者並不一定就騎得適當、騎得穩妥，還要看你的動機和騎法如何。我們都看過雜技團的騎單車表演，但那是演出，目的是引人觀看，不但談不上腳踏實地，反而要盡可能懸在空中。生命倫理學研究中不時出現的一味求新、獵奇、忽視常見問題、藐視人們的日常生活方式和倫常關係的傾向，著實讓人想起雜技團裏的這類單車表演。同時，如果中國生命倫理學不是一種有理念的生命倫理學，只是就問題而論問題的話，那就很容易陷入零散、破碎、迷失之中。一個有益的

方法論需要把高遠的理想與踏實的作風對接、磨練、相容，而不是顧此失彼、只居其一。當代社會政治哲學所講的“反思平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或許也可借鑒。

提出以中國文化為根、借鑒(而不是照搬)西方思想來建構中國生命倫理學，並不預設中國傳統文化都是好的，更不是說傳統文化不需要任何修正和完善就能解決今天的問題、指導現代的生活。事實上，建構就是重構。例如，我在自己的著作中曾經明確表示過“重構主義儒學”的中心意思：面對當代社會的政治、經濟和人生現實，綜合地領會和把握儒學的核心主張，通過分析和比較的方法找到適宜的當代語言來把這些核心主張表述出來，以為當今的人倫日用、公共政策和制度改革提供直接的、具體的儒學資源。這一工作——在當今現代化、全球化、商業化的潮流中——絕不是一件簡單、輕鬆或熱鬧的事情，而是需要踏實的態度、甚至有點坐冷板凳的樂趣，才能進行。特別是，批評、指正的工作要認真進行，包括認真對待別人的觀點；不要把別人的觀點推向極端、自設一個“稻草人”而輕而易舉地打倒。例如，我不知道有任何儒家學者“試圖用儒家的家庭主義來解決我們面臨的所有倫理問題”；我也不知道有任何儒家學者認為“家庭應該是老人養老的唯一照料者”。就我本人而言，我決不會試圖用儒家的家庭主義來解決軍事倫理問題；我也只曾論證，對於老人而言，在家養老一般好過機構養老(而不是什麼“家庭應該是唯一照料者”)。這些差別，隱含著眾多不同的倫理論證和政策建議。這種“稻草人”式的批評，有何學術回報呢？

但我相信，嚴肅認真的建構中國生命倫理學的工作是會有良好的學術回報的。以軍醫倫理學為例，楊放在本期的論文中做了極好的說明：

“國內軍醫倫理學不能只局限於研究內在品德的培育，還必須要探討不同境遇的倫理抉擇以及倫理困境的道德剖析。注重德性修養的中國傳統倫理與深入考察具體案例的當代西方倫理或許可以在方法論上互相借鑒、互相補充。事實上，儒家倫理本來是深入生活

實際、密切聯繫具體情況的一套禮儀倫理，它特別強調守經達權、堅持中庸之道，不太提倡永遠不可權變的絕對規則。而且，儒家倫理還是我們在概念上最熟悉、實踐上依然影響著我們的中國倫理。從這一倫理出發，切實研究當代軍醫所面臨的新問題，我們才有可能為世界軍醫倫理的學術發展作出我們自己的貢獻。”

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是明白無誤的事實。但中國當今的人文學術如何、中國生命倫理學是否真的已經“三十而立”？我想，這個問題還是交給以後的歷史來評價。孔子告誡我們，“不學禮，無以立”，“禮以順天，天之道也”。我們認為中國生命倫理學的前途在於以中國文化傳統為根來重新建構，我們熱忱歡迎大家來參與這一事業。毫無疑問，建構中國生命倫理學的提議不是不可以討論，不是不可以有反對的聲音；相反，如果這個事業有望健康成長、發展壯大的話，那它必將在一定程度上得益於各種各樣的批評和反對。但關鍵是要對所批評和反對的東西有個基本的瞭解，要擺事實，講道理，不能簡單粗暴，不要以學術地位來冷嘲熱諷；我們不怕“苦口”、“逆耳”，但求“良藥”、“忠言”。最近去世的蘋果創辦人喬布斯(Steve Jobs)生前最喜歡的格言是：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我所喜歡的翻譯是：求知若饑，虛心若愚)。我想，這句格言不但是對生命倫理學的年青一輩的一個有益提示，而且也是對這一領域中有所成就、得到榮譽的學者的一種警示：因為，生命倫理學的前路一定很長、很長。讓我們祝願學術之樹長青！人生情誼長存！